

●傅荣贤

简帛文献中的校雠学义例

摘要 刘向典校文籍之义例,在出土简帛中几乎都有体现,说明其校雠工作渊源有自,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出土的简帛实物纠正了对“校雠”一词的错误看法;而古人所谓“大题在上,小题在下”的结论在简帛文献中也不绝对正确。出土简帛中所展示出的校雠学内涵对我们今天关于中国古代校雠学的一些定论有深刻的颠覆性,值得引起学者重视。参考文献 31。

关键词 刘向 校雠学 简帛文献

分类号 G256.3

ABSTRACT Evidences of Liu Xiang's textual criticism appear in excavated documents on bamboo and silk piece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documents on bamboo and silk pieces excavated in the recent years have evidences to correct some wrong opinions on Jiao chou (textual criticism), and will have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studies of textual criticism on the future. 31 refs.

KEY WORDS Liu Xiang. Textual criticism. Documents on bamboo and silk.

CLASS NUMBER G256.3

刘向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奉诏校书撰就《七略》,被推尊为我国校雠学的鼻祖。关于刘氏当年典校文籍的基本原则,姚名达先生“从残存叙录钩出其校书之义例”,其荦荦大者概有五端:(1)广罗异本;(2)互相补充,除去重复;(3)条别篇章,定著目次;(4)雠校脱文脱简、写定正本;(5)命定书名^[1]。姚氏之论可谓精要。台湾学者胡楚生先生《中国目录学》一书中有关“刘向等典校秘书之义例”^[2]的内容就是完全缘姚氏之论而入说的。然证之出土简帛文献可知,这五条义例中有四条早在刘向之前即已出现,表明刘向校雠学并非向壁虚造,而是渊源有自的。今人“以文献证文献”,难免以流为源,误以为这些义例皆为刘向首创。

1 广罗异本

广罗异本,也就是孙德谦先生《刘向校雠学纂微》所说的“备众本”,旨在“异同得失始能辨别而有所折衷”。刘向面对“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而来的“积如丘山”的文献,首先要广罗异本以资比较。如,刘向《管子书录》云:“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三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这里所涉及到的《管子》一书的“版本”就有五种。

在出土简帛中,“迄今所见战国到汉初简帛古籍都是传抄本,还没有能证明是原稿本的”^[3]。就抄本而言,同一内容的文献往往有很多“版本”。如,1994年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战国楚简《性情论》,“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相同,但顺序不同,文字也有差异”^[4]。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脉书》,与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卷前佚书内容相近,只是多出一些文字^[5]。可以看出,同一书各家收藏的本子

往往多寡不一、文字有异。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精彩的文句或文本往往被一再传抄,并经由传抄时的诠释作用,整合入不同的文本或文集的脉络之中,以致一个抄本就是一种诠释。此外,抄者也会按自己的喜好或需要选择地抄写,因此,所抄本未必完整,章节顺序亦未必一致”^[6]。

不仅如此,简帛中还常常出现同一典籍的多种“版本”集中于一处的情况,这些相同文献的同时出现,实有“备众本”的用意。如,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就出土了《归藏》的两个不同的竹简抄本。马王堆汉墓帛书的两个《老子》本子中,“甲本不讳‘邦’字,乙本则讳‘邦’字”^[7],显为不同“版本”的集结。武威汉简中同时出土三个《仪礼》写本,其中,甲本共有七篇,每篇皆有篇题和简序;乙本仅有《服传》一篇,有篇题而无简序;丙本只有《丧服》一篇,既无篇题也无简序。三个本子在篇题和简序上的差异可以证明,乙本的《服传》和丙本的《丧服》是和甲本不同的“版本”^[8]。再拿郭店楚简三个《老子》本子来说,它们“在文字上有不少出入,说明当时流传的《老子》已有异文”^[9]。据研究,上述材料中的王家台秦简、郭店楚简时间在秦或先秦;马王堆汉墓帛书下葬时间为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武威汉简时代迄无定论,但保守的估计也当在刘向典校文籍之前。因此,上述出土简帛文献中的“备众本”应该是在刘向之前即已被广泛使用的义例。

2 条别篇章,定著目次

所谓“条别篇章,定著目次”,也就是孙德谦先生《刘向校雠学纂微》中所说的“条篇目”。因“缛贵而简重”(《后汉书·蔡伦传》),古书往往单篇别行,不相系属。如,“银雀山《王兵》就与《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重合”^[10],

说明古书多以单篇流行。这在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中亦可读见。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仅提及韩非著作中的具体文篇《五蠹》、《孤愤》、《说林》之类,刘向校书时将它们“合众篇”,成为“一本书”,并名之为《韩非子》。

因古书单篇流传,所以有必要将零散篇章分类集结,并确定次第,各标篇名。事实上,这也是刘向校讎工作的重要步骤之一。如,《说苑叙录》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以类相从,一一别篇目。”又如,《孙卿书录》云:“劝学篇第一,修身篇第二,不苟篇第三,荣辱篇第四,……尧问篇第三十,君子篇第三十一,赋篇第三十二。”刘向列举篇目次第,一方面有防止单篇散佚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篇章次序的刻意安排而表达特定的学术思想。如,《四库总目·仪礼注疏提要》认为刘向本《仪礼》的篇章次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反映了特定的内涵,因而也被郑玄所采信。《汉书·楚元王传》也说刘向校书“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又说“序次《列女传》以戒天子”,都是就其“条别篇目”而言的。

汇集相关篇章并进一步“条其篇目”,作为校讎学的重要旨趣之一,在出土简帛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如,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是议罪案例汇编,“包含春秋至西汉时期的22个案例。大体上是年代较早的案件排在全书的后部,较晚的案例则排在前部”^[11]。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则是数学问题集。而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六韬》,“保留了13个篇题,从篇题的序数来看,至少在31篇以上”^[12],这说明简本《六韬》是留意于篇章次第的。而武威汉简《仪礼》中“条篇目”的校讎学性质更为彰显。汉简《仪礼》共有甲乙丙三个本子,其中甲本共有七篇,每篇皆有篇题和简序,如《士相见之礼》第一枚简背面写有简序“第三”,第二枚简背面写有篇题“士相见之礼”。《特牲》第一枚简背面写有简序“第十”,第二枚简背面写有篇题“特牲”。《少牢》第一枚简背面写有简序“第十一”,第二枚简背面写有篇题“少牢”。其余四篇皆然。这样的顺序,自卷外观之刚好相反,读为“士相见之礼第三”、“特牲第十”等等,完全是“条篇目”的内容。甲本《仪礼》虽仅存七篇,但可见与郑玄注本以及大戴本、小戴本的篇次皆不相同,学者猜测可能就是《汉志》中著录的、今已失传了的庆氏本或后氏本,应属于未被郑玄打乱师法家法以前的今文《仪礼》^[13]。又如,今本《老子》分《道经》和《德经》两篇,共81章。出土文献中,郭店楚简的三个《老子》本子皆无篇章标志;马王堆两个帛书《老子》本子则在两篇篇末分别有标志:“《德》。三千册一”和“《道》。二千四百廿六”,其顺序是先《德经》后《道经》,这一顺序与《韩非子·解老》、严遵《道德指归》是一致的,而与今传《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本子不同。“由此可知,《老子》一书的版本流传应该是:最早是简本的不分篇也不分章,然后是帛书本的分篇(先《德经》后《道经》)和不分章,最后是今本的分篇(先《道经》后《德经》)和分章。”^[14]《老子》一书的上述历史

变迁表明,该书不仅被“条”了篇目,而且还被“条”了章目。

据研究,上述简帛材料中的张家山汉简文献在吕后二年(前186年)之前;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断在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之前;武威汉简、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的时间断限前文已述。总之,这些简帛材料皆在刘向校讎文献之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因而也可视为刘向之前即已存在的校讎学义例。

3 讎校说文脱简、写定正本

3.1 关于订脱误

“讎校说文脱简、写定正本”也就是孙德谦先生《刘向校讎学纂微》所说的“订脱误”。从字面上看,所谓“校讎”首先指勘正书籍的文字。诚如范希曾指出:“校讎学者,治书之学也。比勘篇籍文字同异而求其正,钩稽作述指要以见其凡,综合群书而明其类之学也。故细辨乎一字之微,广极夫古今内外载籍之浩瀚,其事以校勘始,以分类终,明其体用,得其条理,斯称校讎学。”^[15]所以,“校讎文字、写定正本”也就成了刘向校讎工作的重中之重。如,《列子书录》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战国策书录》云:“‘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者多。”

从出土简帛文献来看,这种订正文字的工作也已肯定出现。如,在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的第三道编论下,常写有校讎者的姓氏。如,简42在相当于后世“地脚”的部位写有“王已讎”三字,简56的“地脚”处则写有“杨已讎”。^[16]睡虎地秦简《尉杂》中也有“岁讎辟律于御史”^[17]之说。虽然我们尚未发现诸如“以‘赵’为‘肖’”这样具体的文字校讎内容,但简帛文献有校勘程序是可以断言的。学者认为,当简帛文献中出现书写错误时,大致有削改、涂改、添写三种修改方法。“削改,这是出土实物所见最多的,就是用书刀削去表面一层错写之处然后再写……涂改是书写的当时便发现错误,立即用水或唾沫涂抹掉墨汁,再重写。……添写,就是补写,也就是发现写漏了字时(一般是漏一个字),进行补写。”^[18]这其中,削改和添写更像是事后发现错误的修改方法,而事后发现,无疑是“校讎”的结果。就“补写”来说,简帛中也是有实例的。如,“郭店楚简《缁衣》就是把脱文补在简背,《语丛四》就是把脱文补在篇末”^[19]。由上文可知,张家山汉简、郭店楚简时间皆在刘向之前;而睡虎地《尉杂》为秦简,亦在刘氏之前。可以肯定,刘向之前我国即已出现“讎校说文脱简、写定正本”的校讎学义例。

3.2 “校讎”一词正诂

众所周知,“校讎”一词的最早语源见于后世典籍所引刘向《别录》原文。《文选·左太冲〈思〉〈魏都赋〉》“讎校篆籀,篇章毕覈”,李善注引《风俗通》曰:“案刘向《别录》:‘讎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曰讎。’”《慧琳音义》七七引《风俗通》亦曰:

“刘向《别录》:‘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讎。’”又引《集训》:“二人对本校书曰讎。”据此,一般认为校、讎二字是有区别的。即一人校勘为“校”,二人对校为“讎”。但从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来看,“王已讎”和“杨已讎”显然是一个人校勘而称之为“讎”的绝佳例证。台湾学者胡楚生云:“校讎或称讎校,虽有一人自校与二人对校之义,而后世用之,多无区别。”^[20]胡先生之言是可信的。在古代汉语中,两个或多个不同的词往往有相同的解释,称为同训。辨析同训现象是训诂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唐代注疏家在辨析同训时提出了“对文则别,散文则通”的原则,清儒承之。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在《诗经·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条下曰:“按:‘诵’与‘讽’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周官·大司乐》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此对文则异也。《说文》:‘诵,讽也。’此散文则通也。”又如,针对《诗·大雅·皇矣》毛传:“墉,城也。”而《说文·土部》:“墉,城垣也。”段玉裁注曰:“城者,言其中之盛受。墉者,言其外之墙垣具也。毛统言之,许析言之也。”

同样,我们认为“校”和“讎”也是同训,《风俗通》所引《别录》是析言,是对文。如统言或散文,则“校”、“讎”不别,一人自校亦可称“讎”。所以,在今存刘向书录中,《管子书录》“所校讎中管子书……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列子书录》“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显见,刘向书录或称“校”,或称“校讎”,大抵率尔而书,并无大别。传统认为“二人对本校书曰讎”的看法并不绝对。

4 命定书名

“命定书名”,也就是《刘向校讎学纂微》所说的“定书名”。来新夏先生曰:“古人著书写文章,并不是先立题目,后写内容,而只是把个人的思想见解发挥成篇就算了。同时,由于简策的书写制度,图书多是单篇流传,所以有无题目关系不大。”^[21]总体而言,古书有不具书名的,如马王堆帛书《易经》;也有书名杂出的,如《战国策书录》:“中书本号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

从《汉志》所著录的“大凡书,六略三十八,五百九十六家”文献来看,每一“本”文献都有唯一性、专指性的书名。可以肯定,这些书名的命定大多源自刘向,“定书名”因而也是刘向校讎工作的主要义例之一。而追本溯源,“命定书名”并非刘向首创。从传世典籍来看,《春秋》、《论语》、《鸿烈》(即《淮南子》)、《太史公书》(即《史记》)这样的书名早已见存。李零先生指出:“我们发现的简帛古书,差不多都是单篇,当然没有大题。但这是民间本,不是所有的本子都如此。当时的官方藏书,其实还是有大题。比如向、歆校定的古书,它们都是大部头。”^[22]确实,如《管子书录》“所校讎

中《管子》”、《淮南道训书录》“所校讎中《易传淮南九师道训》”、《说苑叙录》“所校中书《说苑》杂事”等等无不表明,“中”(即皇家图书馆)书一般是有书名的。

从简帛来看,有题目的也不在少数。如,阜阳汉简定在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之前,其中的《诗经》出现了两个不同层次的篇章标题,一是在每首诗后面将该诗名称独立书于一简,如S053“此右《[柏]州》”;二是《国风》的一国之诗末尾,将该国名称独立书于一简,如S098“右方《郑国》”^[23]。银雀山汉简的时间定在汉武帝初年,其中“日书”类文献共有五种,《曹氏阴阳》、《阴阳散》、《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三种有篇题;另两种《为政不善之应》、《人君不善之应》无篇题,而是整理者所补加^[24]。可以断言,命定书名或篇名也是简帛文献中早已出现的义例,只是该义例运用得还相当不彻底。同样,定在吕后二年的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八种典籍中,《历谱》和《遣策》无标题。其余六种皆有标题,其标题的具体分布情况是,《二年律令》、《脉书》、《引书》的标题都书写于开篇第一枚简的背面,即篇题在前;《奏赋书》、《盖庐》的题目书写于全书最末一枚简的背面,即篇题在后;而《算数书》的书名写在第六枚简的背面,即篇题在中间^[25]。综上,古籍命定书名之举也早在刘向之前即已出现。此外,从张家山汉简来看,古籍书名位置并无定准,后人所谓“大题在上,小题在下”^[26]的结论并不绝对。

5 结语:校讎学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傅斯年先生曾经指出:“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27]前人有关刘向校讎学研究的历史适可证傅先生之说。刘向典校文籍的成果集中反映在《别录》一书中,《汉书·艺文志》和阮孝绪《七录·序》虽有关于刘向《别录》的片言只语,但因《别录》惜亡于唐末,使得后人不能就《别录》原典考论刘向校讎学大旨。诚如张尔田为《刘向校讎学纂微》所作之《序》云:“自来为校讎者夥矣,莫高刘向氏,顾向之所以为学则人多未之知。”如,清儒章学诚的《校讎通义》虽立志探勘“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际的“道术精微”,并专辟《宗刘篇》重申斯旨,但其倡言立意完全是就见存的《汉志》而生发的。余嘉锡先生指出:“章氏著《校讎通义》,……仅就《汉书·艺文志》参互钩稽而为之说。”^[28]所以,章氏《校讎通义》虽有《补郑》、《藏书》两篇讨论辑佚、采补遗书、校书和藏书等问题,然而其全书重点事实上是讨论由《汉志》所折射出的刘歆《七略》中的目录学思想。诚如蒋伯潜先生《校讎目录学纂微》云:“郑章二氏(郑樵、章学诚)所论者为广义的校讎学,不但当包括目录学,而且认为当侧重目录学。”^[29]

章学诚之后,经过洪颐煊、严可均、马国翰、姚振宗、陶潜宣、王仁俊、顾颉光、章宗源、章太炎等学者的爬梳辑佚,获得《别录》中相对完整的《荀子》、《管子》、《晏子》、《列子》、《邓析子》、《说苑》、《战国策》、《山海经》、《韩非子》诸书

“书录”(亦称“序录”或“叙录”)九篇。另据《道藏》谢守灏《混元圣纪》卷三所引,可得《老子》书录的残本。而关于其他书录的一些“剩膏残馥”,亦所得颇多。如,“《申子》六篇,刘向云:申子,名不害,河东人。郑时贱臣,挟术以干韩昭侯,秦兵不敢至。学本黄老,急刻无恩,非霸王之事”;“《范蠡》二篇。计然,蔡邱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晋国公子也”^[30]等等。此外尚有《子华子》、《于陵子》、《关尹子》三书书录见存,然显为后人依托,学者皆不之信。正是得益于这些辑佚成果,后人才能专就刘向校讎学而为说,并较为完整地揭示出刘向当年校讎工作的主要内容。这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当数近人孙德谦先生的《刘向校讎学纂微》^[31],该书比勘考定,以为刘向校讎学旨趣有“备众本”、“定脱误”、“删重复”、“条篇目”、“定书名”、“谨编次”、“析内外”等二十三目,实为迄今为止《别录》研究中最为完备的一部专著。姚名达先生也“从残存叙录钩出其校书之义例”,概括为五点。

然而,包括孙、姚二先生在内的相关研究都是“以文献证文献”的结果。自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尼雅故城发现第一批汉晋木简以来,这百余年中,中华大地上屡有成批的简帛文献出土。这些简帛多为亡佚一两千年的珍贵文献,具有传世文献无可比拟的历史真实性。以出土简帛为凭借研究传统学术,几乎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颠覆性的成果。著名学者李学勤甚至提出了根据简帛文献“重写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主张。出土简帛中所展示出的校讎学内涵,诚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对我们今天关于中国古代校讎学的一些定论同样有深刻的颠覆性,值得引起学者重视。

总之,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在占有一定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研究能否取得突破性成就,往往直接取决于能否获得新材料。对刘向校讎学的研究再次表明了这一点。

(上接第90页)是当之无愧的。《出三藏记集》不仅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版本目录,也是一部现存最早的佛经目录。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姚名达称其为“南北朝诸家之最杰出者”^[10]。

参考文献

- 1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 版本目录.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 2, 6 僧祐. 出三藏记集卷1: 出三藏记集序.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3, 4, 5 僧祐. 出三藏记集卷5: 新集抄经录第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参考文献

- 1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 影印本.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36
- 2, 20 胡楚生. 中国目录学.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5: 16 ~ 18, 2
- 3, 7 谢桂华等. 二十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 历史研究, 2003(6)
- 4, 5, 6, 9, 11 沈颂金. 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3: 636, 181 ~ 182, 580, 572, 619
- 8, 10, 12, 13, 19, 22, 24 李零.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238, 190, 372, 238, 120, 197, 408
- 14, 16, 18, 23, 25 张显成. 简帛文献学通论.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266 ~ 267, 193, 127 ~ 128, 171, 170
- 15 范希曾. 校讎学杂述. 史学杂志, 1929(3)
- 1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7: 73
- 21 来新夏. 古典目录学浅说.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
- 26 叶德辉. 书林清话.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12 ~ 13
- 27 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28(1)
- 28 余嘉锡. 目录学发微. 成都: 巴蜀书社, 1991: 8
- 29 蒋伯潜. 校讎目录学纂要.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3
- 30 王仁俊. 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36
- 31 孙德谦. 刘向校讎学纂微. 元和孙氏思益宦 1923 年刊本

傅荣贤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 通信地址: 哈尔滨. 邮编 150080. (来稿时间: 2006-09-20)

- 7 僧祐. 出三藏记集卷1. 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第四.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8 僧祐. 出三藏记集卷5. 新集疑经伪撰杂录第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9 僧祐. 出三藏记集卷5. 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第四.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10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 宗教目录.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曹之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教授. 通信地址: 武汉. 邮编 430072.

马刘凤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06级博士生. 通信地址同上. (来稿时间: 2006-09-15)